有穷人到底是谁的耻辱？偏偏有人进一次穷人的窑洞，就以为多大的恩德。

不要拿人当手段

前辈作家赵树理去世后，好多年门前冷落车马稀。有那么一年，赵家突然接到通知，某新任领导要来看望赵树理遗孀及家人。一连几天赵家抓紧准备，端的是清水洒街满屋擦拭喜迎领导关怀。来了来了，赵家公子赵二湖肃立门首迎接，房门打开，领导照例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上前亲切握手，赵二湖心潮澎湃，正准备热泪盈眶，一队人马蜂拥而入，白炽灯噼里啪啦一阵爆响，房间一明一灭若干个来回，不待开口说话，一架摄像机中厅架起，细碎的轮转声震慑出新闻联播式的威严。二湖明白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明天电视台的新闻。顿时笑不出来，眼里的热泪也就倒咽了回去。

这情景和我们看到的许多节日送温暖极其相似。我看过许多报道，领导带着白面粮油走进贫困户，农户受宠若惊。随员立即布置场面，贫民怀抱小袋白面，手捧塑料油桶，和领导合影，一家人被摆成了僵硬死板的造型。更有甚者，送上两百块钱，给两张票子就算了吧，偏要做成支票形状的大牌子，让受访家户高举着照相。领导笑容可掬，穷人形容呆滞，大约这会儿搁谁也是难以笑出来的。他们为什么笑不出来？傻子也能看出来，领导送温暖，用意并不在让你温暖，不过是为了自己在媒体露一露脸，宣传一下自己的亲民形象。带着浩浩荡荡的拍摄队伍送温暖，一看就知道醉翁之意不在济民。

我们不是时常强调领导即服务吗？为什么领导上门，却更像一种商品交换？你得救济，我收获感恩，甚至是一种强索的感恩。场面已经摆好，你若不感谢，下不了台。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种大救星思维。领导就是大救星，他做了工作，你必须感动，必须感谢。大救星思维和救世主心态，造成了送温暖的尴尬场面。

本来，任何地方只要政府职能正常运转，就要消灭贫困。扶贫济困是政府履行正常职能，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感谢的地方。调节收入，削富济贫，以强助弱，本来是政府职能，没有理由特别要求别人感谢你。如果考虑到相当一部分工农群体收入低，是社会不公正带来的，这感谢就更没道理。底层的贫困，根子多由社会管理制度缺失造成。一个访贫问苦掩盖了贫困问责，还要老百姓感谢一回？有穷人到底是谁的耻辱？偏偏有人进一次穷人的窑洞，就以为多大的恩德。

康德有句名言："永不拿别的个人当手段"。一句话直指公民社会的问题核心。人是目的，永远不要把人当成手段。政府领导的所有公务服务，都应该是为了社会成员的发展进步，而不是别的什么目的。访贫问苦，为了救济，为了扶贫，还是为了政绩？为了出镜？为了显摆？如果是后者，那么所有的下乡出行，所有的宽慰鼓励，都不过是假惺惺表演。所有的救济对象，都不过是官员风光露脸的道具而已。造访的没有诚意，年复一年的访贫问苦，势必沦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羞辱。

人心换人心。真心送温暖才能送去温暖。借送温暖以营私，一袋面一桶油什么的不解决问题。你没有携带阳光，那茅屋瓦舍当然是冰冷冰冷的。

（摘自《南方都市报》2.26）

80分不完美，60分也不完美，但不要因为80分不是100分而否认从60分进步到80分的意义。

其实不一样

据说战国时期有一个学派叫"合同异"，认为"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万物看起来不同，其实都一样。这个伟大的"辩证法"可了不得，谁要是熟练掌握了它，辩论就能无往而不胜。请看：

"你不也吃肉吗？有什么资格批评归真堂活取熊胆？其实都一样。"

"我们这公款消费几千亿，但有报道称奥巴马全家度假也花费公款几百万。官员乱花钱，其实都一样。"

"我们是限制言论，但是维基揭秘一出来，西方政府不也气急败坏吗？政府都想控制言论，其实都一样。"

"看守所神秘死亡和刑讯逼供是存在，但是美军的伊拉克监狱虐俘案呢？监狱虐待犯人，其实都一样。"

……

一句话，我站在粪坑里，所以我脏；你手里有泥巴，所以你脏。我们都脏，本无不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哦耶。

一味"合同异"，要点就是否认差异，否认差异就是否认了进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为一切落后进行辩护。岂止否认，还要嘲讽。我仅仅是"坏"，你又"坏"又"虚伪"，我是真小人，你是伪君子。我呸！

在应该学习他国长处的时候诉诸"国情"，在为本国不足辩护的时候却诉诸"普世"，还真是辩论中的制胜法宝。好比一个孩子，在小明学习的时候，说"我肚子疼，不能跟小明一样学习"；在吃垃圾食品时却肚子不疼了，说"你看小明都吃了"。问题是，这是一回事吗？

西谚云：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意思是80分不完美，60分也不完美，但不要因为80分不是100分而否认从60分进步到80分的意义。不过中谚却说：五十步怎么可以笑百步？要我说，五十步怎么不可以笑百步，九十九步都可以笑百步。人类文明的进步靠的就是点点滴滴的努力，大的进步值得大的肯定，小进步值得小肯定。别说什么"关了灯都一样"，21世纪了，为什么总要关着灯呢？

（摘自《新世纪》第12期 刘瑜/文）

若把"钱"字从价值观中清除出去，这个价值观，也就无任何价值可言了。

我们的价值观不能否定"钱"字

近来，有位名家说到这样一个观点："所谓民族的价值观一定不能有'钱'这个字。"这个看法不对。

我们的价值观中，能否有"钱"字？刚改革开放时，就有争论。深圳成为特区后，曾提出一个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有些人就横加反对，认为这是"拜金主义"，是"一切向钱看"。

30多年过去了，如今中国面临进一步深化改革时，又出现类似的问题和争论，说明这个问题并未解决。其实，这种争论不是现在才有，早在"五四"运动时代就有了。1923年12月26日，鲁迅应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题目为"娜拉走后怎样？"（此文收于《鲁迅全集》一卷中）

鲁迅明确指出："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鲁迅先生89年前的这段话，是何等精彩、深刻、切中要害。我国有些知识分子，自己有钱不愁生计了，就鄙视"钱"字以标榜清高。其实钱就是经济的标志，民生的代表，财富的度量。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创造财富，就是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如果主流价值观中不能有"钱"字，这种价值观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即使古代的孔老夫子，虽然主张"有教无类"，但对其学生也要收一定肉干作为学费，而肉干是需花钱的。

笔者参加全国两会已有15年历史。会议期间，过去要缴伙食费与粮票，后来不收粮票了，收点钱也是象征性的，再后来干脆钱也不收了。而伙食标准却不断与时俱进，"鱼肉"自不在话下。我们不能因摆脱了"饭需钱买"的规定，而不去按一下"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的胃，就"说钱为卑鄙"。

斥钱为卑鄙，要把"钱"字从价值观中清除掉，必然是有钱的人，至少是不为钱发愁的人。但广大人民群众呢？柴米油盐，住房、医药、教育、交通，哪样能离开钱？家如此，国亦如此。我们虽然经济总量已达世界第二，但被13亿人口一除，仍处世界后位。目前虽刚入小康，但仍不富裕，甚至还有近亿人口未达到国际的脱贫标准。当下切不可轻易否定"钱"字，若把"钱"字从价值观中清除出去，这个价值观，也就无任何价值可言了。

（摘自《北京日报》3.26 朱相远/文）

官场流行语

别说"不好"，要说就说"欠佳"；
别说"假新闻"，要说就说"策划"；
别说"罚款"，要说就说"执法"；
别说"涨价"，要说就说"调价"；
别说"下滑"，要说就说"负增加"；
别说"贫困"，要说就说"不富裕"；
别说"找三陪"，要说就说"休闲"；
别说"乱收费"，要说就说"集资"；
别说"贪财好色"，要说就说"禁不住诱惑"；
别说"行贿"，要说就说"劳务费"；
别说"骚扰女人"，要说就说"她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别说"倒闭"，要说就说"改制"；
别说"难逃法网"，要说就说"运气不好"；
别说"经济损失"，要说就说"交学费"；
别说"个人意志"，要说就说"组织安排"；
别说"打击报复"，要说就说"工作需要"；
别说"跑官要官"，要说就说"要求进步"；
别说"法职"，要说就说"管理不到位"；
别说"权是上级给的"，要说就说"人民赋予"；
别说"不落实举报"，要说就说"为了安定团结"；
别说"一人说了算"，要说就说"散于拍板"。

（摘自《杂文月刊》第1期 温智慧/文）

"必须"的力量

1877年7月31日，被囚禁的进步大学生波古柳博夫因在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面前没有行脱帽礼，竟遭到毒刑拷打。此事在俄罗斯民间引起轩然大波，女青年薇拉·查苏利奇愤慨至极，1878年1月，她只身从外省赶到彼得堡，朝那个臭名昭著的家伙射了一颗子弹。

薇拉当场被捕，后移交有陪审团参加的公开审判。她给人的印象是聪慧、和善，完全一副柔弱女性的模样，人们很难将之与"凶手"一词联系起来。

审理开始了。薇拉丝毫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而是再次指控特列波夫惨无人道的暴行；"迫使一个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再次接受鞭答和酷刑，这是多么残忍。我觉得，绝不能也不应该让这件事无声无息地过去。我在等待着，可人们都保持缄默，特列波夫依旧有恃无恐地一次又一次滥施淫威。当我看不出有任何其他办法可改变这种状况时，便下定决心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向世人证明：绝不能让这个残酷凌辱人类个性的人逍遥法外……举起手来向一个人开枪——这是可怕的，但我意识到，必须这样做！"

法庭辩论异常激烈，被告的辩护律师握理力争，慷慨陈词："薇拉蓄谋杀人虽是事实，但她并非出于私心和个人复仇，而是为了保护另一个人的思想和名誉。在她的动机中有一种正直而崇高的热忱。这个柔弱的少女勇敢地举起了自己的手，去制止践踏、凌辱人类尊严的行为，她担负起了整个时代的职责……"律师的发言震撼了整座审判大厅。最终，陪审团宣告薇拉·查苏利奇无罪。

开始，大家几乎不敢相信它是真的，后来媒体、民众便明白了——那位律师，那些陪审员，他们也是"人"，也是"生命"，他们心中也藏着一个小小的"必须"，一记伟大的冲动；无论如何，我必须站在正义的一边，必须对得起这位美丽的姑娘，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她无私的英勇和付出；无论如何，要给她和她的亲人一个惊喜，给苦难深重的俄罗斯一个惊喜。

生命是有尊严的，生命的权利和梦想是有整体感和连锁性的，不能因为罪恶暂时没有落到你的身上便暗自庆幸，不能因为老鼠没有窜上你家的炕头便高枕无忧——今天可以是他、是她，明天就可以是你、你们。罪恶蔑视的乃每一个，而非某一个。她最大的珍贵在于：那件事终于有人做了！

（摘自《廉政瞭望》第1期 王开岭/文）

赫鲁晓夫理解不了毛泽东的"纸老虎论"

我记得1954年我从中国回来以后曾告诉过我的同志："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了。"我是根据毛泽东的各种言论得出这个结论的。毛泽东讲的某些事情引起了我的戒备。我始终也没有搞清楚他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例如，他有一个有名的口号"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我认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竟把美帝国主义当成纸老虎，而实际上它是一只危险的猛兽。他第一次提出"纸老虎"口号的时候，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还是好的，但是这个口号使我们有点为难。

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我和毛泽东穿着游泳裤躺在游泳池边上，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问我："赫鲁晓夫同志，你怎么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实力，你就能看到我们显然比我们的敌人强。你想，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在一起能动员多少个师啊！"

那年。

我说："毛泽东同志，这种想法现在可过时了。你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的人多来计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头和刺刀解决纷争的时候，谁的人多刺刀多，结果的确不一样。可是出现机关枪以后，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能占上风了。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哪一方的部队愈多，它的炮灰也就愈多。"

他试图要我相信原子弹本身也是纸老虎。他说："听我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一百个，二百个，一千个，都行。"我竭力向他说明，只要一两枚导弹就能把中国全部的师都炸成粉末的。但是对我的争辩他连听都不听，而且显然认为我是个胆小鬼。

1957年，他显然改变了他的调子。他来参加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一次亲切、坦率的交谈中，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我在报纸上看见你们国防部长朱可夫说，要是哪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帝国主义国家进攻，你们将迅速回击。我认为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毛泽东说，"我想，假如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你们不必干预。我们自己会打他们。你们的任务是保存自己。让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再则，假使你们自己遭到进攻，我认为你们也不应该还击。"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撤退。"

"撤到那里去？"

"你们曾经撤退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你们一直撤到了斯大林格勒，假如你们再次被人进攻，你们可以一直撤退到乌拉尔，坚持两三年就行了。你们有中国作后盾。"

"毛泽东同志，假如战争现在就爆发，你认为会打多久？这回可不同于上次大战！那次战争用的是飞机和坦克，现在则有了导弹和原子弹。你根据什么说我们会有三年的时间撤退到乌拉尔去呢？我们很可能只有几天的时间，此后，什么也不会留下了，仅剩下一些破烂而已。如果我们告诉敌人我们不还击的话，那就等于是请他们来打我们了。"

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双方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摘自《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

父亲梁实秋与鲁迅并无仇恨

我的父亲梁实秋曾说过一生中有四个遗憾：一，有太多的书没有读；二，与许多鸿儒没有深交，转眼那些人已成为古人；三，亏欠那些帮助过他的人的情谊；四，陆放翁但悲不见九州同。

1927年前后，父亲与胡适、徐志摩等过从甚密，他们都是"新月派"的人，父亲与徐志摩曾胡适叫"大哥"。后来各自忙各自的事情，来往不多。父亲也是在那段时间，与鲁迅先生爆发了著名的"论战"。即在1927年11月，父亲应《复旦旬刊》之请，发表《卢梭论女子教育》，对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当时，鲁迅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对父亲的文章极为不满。一个月后，他在《语丝》发表《卢梭与胃口》一文，对父亲的观点进行驳斥。随后，父亲毅然提笔应战……

父亲生前不大提他与鲁迅的是是非非，那时我们在台湾，鲁迅的书与毛泽东的书一样，都属禁书，所以年轻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过节"。直到后来到了美国我才陆陆续续读到他们当年的文章。有一次我问父亲："你当年和鲁迅都吵些什么？"父亲回答得很平静，他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两个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其实他还是很欣赏鲁迅的文学的。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父亲更强调文学作品的人性，比如母爱，穷人有，富人也有，不论阶级，不管穷富，文学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写永恒的人性，这就是父亲的信念……（摘自《往事不寂寞》梁文蔷口述）

那事

我是『五毛』

1972版五毛钱纸币，不过巴掌大小，蓝色成为其主色调。在这版纸币的正面，是一张纺织厂细纱车间的图案。细纱车间图案中绘有三位纺织女工，左边是个正在换粗纱的女工，右边是个巡回中的挡车女工，正中央则是一个推着落纱机的女工——这，就是我。

现在，据说这种1972版人民币五毛钱纸币在钱币收藏市场价格不菲，人们关注它的，更多是价格与升值空间。但对于我来说，1972版人民币五毛钱纸币，记载了我的一段人生经历。

我在汇文一小上的小学，中学上的是女八中。1966年高三毕业，正当毕业考试结束，准备迎接全国统一的高考填写志愿时，"文革"开始了，求学之路就此戛然而止。

不幸接着降临，1967年6月8日，父亲蒋光鼐因癌症医治无效与世长辞。6月12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的右下角，登出了父亲的讣告——"纺织工业部部长蒋光鼐逝世……"。父亲的追悼会也是这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周恩来总理参加了追悼会。

父亲在病危时，曾对母亲说："以后要是没有人养你，你就去做工吧。"父亲去世后，母亲得到了民政局给行政级别三级的干部遗属发放的500元抚恤金，以后就没了经济来源。那时，我的哥哥姐姐们或身处逆境，或发配外地，只有我在北京，能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而当时摆在我面前的路似乎也只有一条——上山下乡。当时我想得最多的，是如果我去上山下乡，谁来管母亲。

那人

母亲患有糖尿病、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等多种疾病，每次心脏病发作都要立即送医院注射西地兰。如果我离开北京，母亲再无人照顾了。万般无奈，我以母亲的名义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等待了三个月，终于在1970年新年到来之前有了回音。

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我被安排到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棉纺分厂，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这也是我们家祖祖辈辈以来第一个工人，一个地地道道的纺织女工。

记得发行这张纸币的那个月，我们每个人的工资里都有一张这样的新币。发工资那天，我还没进厂，路上碰见了我师傅的女儿，她远远就冲我喊："钱上有你！"当时我未解其意，等进了车间，师傅才告诉我，前些日子在我们车间照了许多相的那些人，就是这张五毛钱的设计人员。这张钱中间那个推落纱机的女工，就是照我的照片画的。

链接

蒋光鼐，字憬然，因抗战而闻名。这位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曾指挥过著名的淞沪抗战，在《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中有这样一句话："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字字铿锵，国人振奋，敌人胆寒。

1949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又历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

（摘自《北京晚报》1.8 蒋定桂/文）

《高玉宝》有关真相揭秘

1955年，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出版发行。

这本书一版再版，共印行了500多万册。

按照作者高玉宝的自述，1948年参军时，他还是一个文盲。一年后，他开始动笔写自传，此时仍是字画结合，以画代字，如"杀"字不会写，先画一个人头，再在这头上画把刀……

奇迹在两年后发生了。1951年，在他人的指导下，高玉宝完成了20多万字的《高玉宝》。

书中人物，均用现实中的真名真姓。

其中就包括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亦即"周扒皮"。

"没见过高玉宝"

"周扒皮"为催大家早点上工，半夜躲进鸡舍学鸡叫……这是《高玉宝》中，最著名的情节。

近年来，不断有人指出，无论从农学，动物学和当时农村普遍租佃关系的史实来看，这些细节都与事实相悖。从上世纪40年代初到1947年土改期间，曾外祖父家里，老大、老三负责种地，老二做生意，其他孩子读书。因为人手不够，陆续雇过长工和短工，都有名有姓。

高玉宝自称在周家放过猪，但周家人从来没见过他。

我的外祖父周长义，于2008年春节过后离开人世。生前，他见到我，一直复一句话：咱家没剥削过人，也从没见过高玉宝这个人——

1963年春夏之交，他（高玉宝）来了一趟。我和人正在地里干活。高玉宝40岁模样，招呼大家一起要开个小会。黄店有两个生产队，山后队的人没理睬他。吕××跑过来了，吕参军回来当队长和把头组长（五副辛铧一个互助组），领着高玉宝，现找了几个人，高玉宝隔老远在地里给几个人握手。我这也是第一次见到高玉宝。高玉宝对我说：谁说我没在你家干过活？我学木匠时还给你家做过马槽子。这事很多人都清楚。人家来调查，你们照我那样说没有错。高玉宝又说他现在很烦恼，小人多。他又对我说，写"周扒皮"不是写你家的事，不是写咱这地方的事，但天底下能没有这样的事吗？小说是拿（到）全国来教育群众的，有没有重名重姓的，肯定有。回去告诉你们家里大人和小学生，不要乱讲话……

据外祖父周长义回忆，高玉宝这番话，中心意思就一句：外面来人问要回答，我在老周家干过活。1963年的年度关键词是"忆苦思甜"。这似乎可以为高玉宝急着到家乡"开小会"做注脚。

给曾外祖父家做过10年长工的刘德义，解放后做过大队的贫协主席，于1978年去世。他的儿子告诉我，从来没听他爹说过周春富家半夜学鸡叫。

荒草和《高玉宝》

我在搜寻史料时，从古旧市场淘到最初的《高玉宝》版本，由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后记中，有荒草的《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那么，荒草是谁？

直到2008年，由于机缘巧合，我才详尽了解到关于"荒草"其人与《高玉宝》的成书过程。荒草，原名郭永江，1916年出生，1940年来到延安，创作歌剧《张治国》，反映八路军大生产，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1951年，他赴朝鲜采访，回国后出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辑、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上世纪70年代，郭永江因病，回到故乡资阳，1984年迁居重庆，1993年病逝。

临终前，他写信给资阳文献学会，郑重声明：《高玉宝》是我写的。

上世纪50年代初，全军大扫盲。为树立典型，郭永江接受任务，帮助高玉宝修改自传……高玉宝的原稿实在太差，他无法修改，最后在组织授意下干脆代笔。他写完一章，高玉宝照着抄写一章。总政文化部文艺处与出版社约定，以后每版书必附荒草《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稿酬平分。

在"反右"之后，郭永江的后记和名字逐渐退出再版的《高玉宝》。

郭永江子女介绍，其父晚年讲过，"半夜鸡叫"是根据民间传说加在周春富身上的。

（摘自《周末》3.22 孟令蓉/文）

那书